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台湾的发展

——吕正惠先生思想述评

张帆

(福建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 福建 福州 350001; 福建师范大学 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作为台湾地区左统派重要的思想家与理论家, 吕正惠先生对于现代中国的探索之路, 既扎根于悠久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之上, 具有纵深而广阔的大历史观, 同时也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台湾地区的文化状况、思想根源进行深入分析, 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深刻把握台湾社会性质, 以及台湾走向祖国之路的历史必然性, 推动了台湾地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与实践行动。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吕正惠; 台湾地区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767 (2025) 01-0116-06

收稿日期: 2024-11-29

作者简介: 张帆, 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台湾文学。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是 1938 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重大思想与政治命题。他在大会政治报告中讲道: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即是说, 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 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台湾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在台湾地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始终与追求两岸统一的历史使命相融合, 贯穿于台湾地区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民族主义统一运动当中,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重要一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台湾左翼知识分子吸收中国革命道路的宝贵经验, 并在殖民、内战与冷战的格局下, 与日本殖民主义、西方新自由主义、国民党买办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相抗衡的重要思想成果, 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明的斗争性、实践性与历史性,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

作为台湾地区左统派重要的思想家与理论家, 吕正惠先生对于现代中国的探索之路, 既扎根于悠久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沃土之上, 具有纵深而广阔的大历史观, 同时也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台湾地区的文化状况、思想根源进行深入的分析, 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深刻把握台湾社会性质, 以及台湾走向祖国之路的历史必然性, 推动了台湾地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与实践行动。可以说,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两个部分相得益彰, 共同构成了吕正惠先生完整丰富、相互贯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论体系, 形成他独特的理解台湾问题与探索中国统一道路的方法论。他在这两方面的巨大成果与贡献, 使他不仅是台湾地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家, 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台湾地区的典范。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第 534 页。

吕正惠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思想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涵：

（一）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吕正惠先生系统地介绍了卢卡奇、伊格尔顿等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文艺思想，并对他们的批评理论加以综合评述，吸收他们的思想成果，从哲学观、历史观、方法论等方面系统地建构了台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在文化领域开展反帝、反资与反独的斗争

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笼罩的台湾社会，吕正惠先生始终坚定不移地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学、历史领域持续地向台湾社会的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文化展开斗争，从思想到形式上清理了殖民、内战与冷战结构造成的精神创伤，推动了台湾文化领域的革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台湾的传播与发展，以及台湾左翼思潮的赓续与壮大。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民族文化相结合

吕正惠先生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重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意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民族形式相结合。他从人类文明史上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对立的格局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兴衰演变历程分析二者的不同性质，指出与不断断裂、掠夺、扩张的西方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大一统性和整体性的进步意义，从而提升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中的地位。他通过对中华文明创造的两次文化经典时代的论述，阐述中华文明内在的丰富性与创造性，指出中华文明即将创造出第三次文化经典时代，展现出强大的民族文化自信。

（四）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范式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探索

吕正惠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台湾地区现代性矛盾的揭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集中化、系统化、理论化的理解与阐释，以及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科学分析，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框架之内，重新审视台湾依附于美日的现代化经验，并在中国近代史中思考台湾走向现代中国的道路。

这四个部分环环相扣，形象地展现出吕正惠先生身处殖民主义、自由主义的亲美日反共意识形态之中，艰难曲折探索两岸统一道路的过程。这一过程立基于他对台湾社会的深刻洞察之上，伴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从对现代主义、殖民主义的批判、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开始，深入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对“西化”思想倾向进行批判与清理，以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立场拨开重重迷雾，指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与必然性。

可见，吕正惠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及其批评实践，是对两岸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积极介入，是对当代两岸社会重大思想问题的思考与回应，是对两岸统一道路的努力探索。在大量的论争、作家作品分析、自述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解读中，吕正惠的思想涵括了阶级斗争观、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历史哲学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论，犹如一把解剖刀，深刻地剖开台湾社会的病症，又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台湾社会“走向现代中国”的曲折道路。

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现代主义

对 20 世纪 60 年代现代主义思潮的批判，是吕正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出发点，是他反叛西方思想的异化与桎梏，走向现实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

台湾光复以来，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吕正惠自述自己的

思想历程,20世纪70年代政治上的党外运动,文化上的回归现实思想,促使他开始质疑西方理论,“也就是在这时候,我开始偷读一向被视为禁忌的马克思,开始接触历史唯物主义。它告诉我,所有精神性的东西,都可以找到物质基础。也就是说,再抽象的文学理论、再唯美的文学,都可以从广阔的历史背景加以解释”^①。在这个过程中,他吸收了卢卡奇对于西方现代文学主流的总批判,以现实主义文学观展开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清理与批判。

首先,他指出,现代主义是台湾地区在内战冷战双重结构下,与祖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断裂,全面转向西方自由主义的病症。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文学潮流的交锋,实际上代表了社会的两种发展模式。其次,他认为,对于现代主义的分析,不能停留在“比较文学”的角度,“我们还必须从宏观的、历史的、社会的观点去看待这一问题,才能掌握到其中的一些症结,才能看到这一文学现象较受人忽视的一些面向”^②。他从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社会根源与历史处境入手,质疑基本上还是农业经济的台湾,却能够流行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现代主义思潮,这一物质基础与精神生产相背离的现象,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客观规律,从而揭示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本质——西化的、反传统的、无根的,缺乏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基础。

吕正惠先生指出,台湾地区对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接受与传播,所产生的扭曲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不仅仅是台湾地区独特的文学现象,更深刻揭示了第三世界地区面对西方文化霸权,应该如何发展自身文化的普遍困境。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不能以西方的观点来看待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的文学问题。我们应该发展出全面的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的社会学以来探讨第三世界在文学发展上的困境。从这一复杂性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毫未经过考虑地就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全盘接受,生吞活剥地加以模仿,无论如何是走不通的”^③。

二、对殖民统治问题的超克

台湾曾经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但是殖民统治历史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终结。殖民统治造成的心灵创伤与主体危机,因为台湾在战后迅速地被编织入西方自由主义阵营而失去了清理的机会。因此,吕正惠先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展开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与文学史的意义。

第一,通过分析杨逵、吕赫若、叶荣钟、吴浊流、赖和、欧坦生等作家的作品思想与艺术手法,吕正惠先生深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反帝反殖民文学创作与思想传统,重新接续被国民党反共统治斩断的台湾新文学的左翼传统。在《殉道者——吕赫若小说的“历史哲学”及其历史道路》一文中,他指出吕赫若是一个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的小说家,吕赫若的小说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及政治意涵,并且关注社会体制下个体的命运。从《牛车》《庙庭》《才子寿》《合家平安》等小说中,吕赫若极力呈现“历史社会的必然力量”。^④对于作品的分析,他不仅注意

① 吕正惠:《曲折的道路——我如何接触西方理论》,《台湾文学研究自省录》,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14年,第328页。

② 吕正惠:《现代主义在台湾——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4-5页。

③ 吕正惠:《现代主义在台湾——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0页。

④ 吕正惠:《殉道者——吕赫若小说的“历史哲学”及其历史道路》,《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问题》,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到了日据时期复杂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在这一背景下讨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一关系之下，具体地分析情节的展开与人物行动的内在意涵。

第二，重新挖掘台湾新文学中的抗日精神。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近代屈辱的缩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创伤，因此，台湾文学中的抗日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走向民族复兴的一个部分。吕正惠先生通过对日据时期文学的分析，指出自日据以来，台湾文学创作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传统，台湾左翼作家把争取台湾摆脱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大家庭、实现民族解放作为奋斗目标，这也证明了台湾始终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第三，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实施的“皇民化”运动，是台湾产生“去中国化”与亲美日的分离主义错误思想的历史根源。不同于台湾的“独派”学者毫无反省地将“皇民化”等同于文明进步，并且把作家在“皇民化”政策下被迫或者主动地维护这种逻辑视为台湾“去中国化”主体性的开端，吕正惠先生从龙瑛宗、王昶雄、周金波等作家塑造的日据末期典型小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皇民化”、现代化与民族性的纠葛与痛苦，揭示出殖民现代化过程引发了台湾知识分子的一些思想与行为上的难题，形成了他们特殊的认同危机，造成了他们对于自己民族与文化的自卑，以及对于殖民统治者文明与进步的仰慕，导致了“他们是完全缺乏‘殖民-被殖民’对抗意识的悲哀的小知识分子，其面目迥异于赖和、杨逵笔下的批判者与反抗者”^①。其根源在于日本“皇民化”运动以所谓“文明进步”而导致台湾知识分子认同错乱，“（作为殖民统治者的日本）要迫使台湾人放弃它（自己）的本性，使台湾人认同日本侵略中国的作（做）法，使台湾人为它的‘南进’效命，它用一种特殊的逻辑——‘皇民化’等于文明进步，为此必须抛弃自己的本性——把部分台湾知识分子逼入林柏年的困境之中”^②。“近代世界史的殖民经验与被殖民经验可谓多矣，但像日本‘皇民化运动’那样的高压式的要被殖民者放弃它的‘本族特性’、像台湾那样的对自己的‘本族特性’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自贱’的反应的，大概并不多见。”^③吕正惠先生指出，认同“殖民现代性”的逻辑也导致了台湾产生“脱亚入欧”论。^④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吕正惠先生看到台湾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当我们自认为已从‘落后’状态进入‘现代文明’时，我们在心理上是不是在‘重制’日本的‘脱亚入欧’论，我们是不是‘无媒介’的肯定‘现代化’，对现代化的成就一力赞扬、对尚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充满蔑视？如果是这样，反过来讲，我们就还未摆脱比我们‘更现代化’、因而‘更进步’的日本（以及战后对我们的影响类似于战前日本的美国）的阴影。我们在他们面前无法‘站起来’，因而我们对比我们‘落后’的国家就更强烈的企求表现出我们的‘现代化’”^⑤。因此，吕正惠先生对台湾被殖民统治这一问题的超克就不仅仅局限在反殖民与获得民族解放这一形式之上，更是通过历史化的视角，指出了台湾在去殖民与去帝国进程上尚未完成与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同时这是整个亚洲从西方话语之下挣脱出来的必由之路。

① 吕正惠：《龙瑛宗小说中的小知识分子形象》，《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问题》，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② 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脱亚入欧论与“皇民化”教育》，《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问题》，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③⑤ 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脱亚入欧论与“皇民化”教育》，《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问题》，台北：人间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④ 吕正惠：《陈明忠回忆录〈无悔〉序》，《走向现代中国之路》，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年，第58页。

三、重新思考中国崛起的中华文化根基

在对台湾现代主义与殖民主义批判的过程中,吕正惠先生指出二者存在着一个共性,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无论是日据时期,还是现代主义发展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在以社会的现代化及进步作为基本思考模式时,实际上是以‘西方’和‘传统’作为对比的。西方是进步的,相反的,传统就是落后的象征”^①。展现在文化上,就是民族文化的失根与断裂,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自卑,甚至是媚日、崇洋、反中情结的滋长。

吕正惠先生从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角度,将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发展相互对照,质疑目前的文明史观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霸权的问题。他通过对比分析中西文明历史的发展,认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史上最让人瞩目的文明,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分别为中华文明的两次黄金时代,而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即将进入中华文明的第三次黄金时代。吕正惠先生以强烈的文化自信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的特质——西方文明一直都是掠夺性的,而中华文明“从不以征服和掠夺作为主要目标。华夏文明的扩展,主要是逐步而渐进的,让周边的‘他者’自愿的选择融入华夏之中”^②,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再生能力和内聚力,中华文明的形成历史非常地悠久,不是依靠武力,而是由“文明内部的潜在发展力自然而形成的”^③。因此,“以西方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式的向外扩张的历史观,是没有办法理解中华文明的”^④。

可以说,吕正惠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肯定,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具有重大的价值与意义。一是重新思考中国崛起的文化根基,从中华文明内部去寻找中国道路的优越性。他认为,“从五四以来,说得短一点,从二十世纪八〇年代以来,我们所有的现代知识,特别是关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还有世界发展的知识,全部来自西方,而现在我们却要调转方向,去思考西方所以产生重大问题的原因,而且还要重新思考我们长期以来非常瞧不起的传统文化很可能正是中国重新崛起的深厚基础,这样的思考模式恐怕很少人想去面对”^⑤。二是从根本上改造台湾内部的思想认同问题。有感于目前弥漫于知识界的自由化思潮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思想遮蔽下的认识论问题,吕正惠先生认为,“我所坚持的中国信念反而让我能够把问题看得更全面”,而不会被“美国价值观”所迷惑。^⑥三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价值观作为一种批判性资源予以活化,重新构建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主体位置。因此,吕正惠先生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就不仅仅是对“文化中国”的怀旧与追忆,而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富有悠久历史与现实批判力,象征着人类文明新的发展道路的文化。

四、构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吕正惠先生认为,“不论在中国本部,还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

① 吕正惠:《战后台湾社会与台湾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97页。

② 吕正惠:《中国文化的第二次经典时代》,《走向现代中国之路》,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年,第182页。

③④ 吕正惠:《中国文化的第二次经典时代》,《走向现代中国之路》,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年,第186页。

⑤ 吕正惠:《四十岁从头学起》,《走向现代中国之路》,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年,第22-23页。

⑥ 吕正惠:《中国社会主义的危机?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向现代中国之路》,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年,第105页。

代的一系列阵痛中，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要的分析手段和行动方针，已经成为一种主要潮流”^①。可见，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使用，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潮流之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具有充分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意识与实践意识。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观念、意识，都只能从经济关系上说明，吕正惠先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就是从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上分析探讨台湾的文化与文学，从而获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准确定位。

在《卢卡奇的理论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寻求者——卢卡奇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卢卡奇〈现实主义论〉导言》《布莱希特论卢卡奇》《回顾本世纪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纠葛》《伊格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学与意识形态》等文章中，吕正惠先生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论述，展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深厚积淀。

吕正惠先生的思想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他始终使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去分析台湾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台独”思想产生的根源与阶级基础，从语言、省籍、教育、工作等多重经验去展现台湾社会的复杂现象与时代转变。从广阔的现实视野深入中国革命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分析中国的革命、改革与发展道路。

吕正惠先生认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任何现象都必须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里来看，才能透彻的了解”。他始终应用历史的、联系的、发展的角度去看待两岸的统一问题，“台湾问题是美国和日本采取联合行动，刻意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残余。台湾问题不解决，就是中国百余年来被侵略的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应该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来看待台湾问题，不应该对台湾的所谓‘民主’抱有幻想”^②。

孟子说，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吕正惠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居仁、正礼、行义的大丈夫，他面对台湾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分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携手形成的话语霸权，始终秉持着传统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与博大胸怀，视中华文化是他的精神家园。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多层次、多视角的探索，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实践的中国话语建构相互呼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近百年来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发展和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他始终直面台湾历史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科学的回答与诊断，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不断推向深入。

（责任编辑：隋欣卉 何妍）

① 吕正惠：《战后台湾社会与台湾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96页。

② 吕正惠：《陈明忠回忆录〈无悔〉序》，《走向现代中国之路》，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年，第58页。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in Taiwan —A Review of Mr. Lü Zhenghui's Thought

ZHANG Fa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thinker and theorist of the Left-wing unification faction in Taiwan, Mr. Lü Zhenghui's exploration of modern China is rooted in the rich and profound soi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a deep and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is also based on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Marxist scientific theory. He applie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to conduct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situation and ideological roots in Taiwan, and grasped the social nature of Taiwan and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Taiwan's path towards motherland from a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perspective, promoting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action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aiwan.

The Scars of the Colonial Rule: Lü Zhenghui's Research on Taiw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WU Mingsung

Abstract: Lü Zhenghui's research on Taiw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with a stance of facing history directly, reveals the "scars" existing in the creative activities of Taiwan writers under the colonial occupation. Facing the relevant arguments within the island that ignore the "scars" and distort history at the expense of the truth, Lü Zhenghui, through combing and reproducing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his research and by means of historical and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s, has made a refutation that sets the record straight. Only by facing the "scars" squarely can we effectively clear away the remaining colonial remnants in Taiwan society and heal the historical wounds. This is not only the inspiration provided by Lü Zhenghui's research on Taiw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but also should serve as the stance and attitude we uphold when engaging in the research of Taiwan literature.

The Second Classical Era: Lü Zhenghui's Theory on Tang Dynasty Literati

GAO Weihong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being well-known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for his research on Taiwan literature, Lü Zhenghui is also known for his research on literature and literati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rough his research on mid-Tang literati such as Du Fu and Han Yu, Lü Zhenghui proposed concepts with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such as the "second classical era" and "cultural unification", replacing Naito Konan's "Tang and Song transformation theory", reinterpreting Du Fu's social poetry writing as a culmination of the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He argues that Han Yu's "Way of the Teacher" gave rise to a new system of thought and ideology, capable of replacing the aristocratic-centered intellectual model that had dominated sinc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alyzing Lü Zhenghui's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Tang Dynasty literati will help us grasp Lü Zhenghui's central academic concerns, and may also help us find the inherent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modern times.

The Re-study of *Hou Han Shu* Southern Song Dynasty Futang Jun Xiangben

SU Xiaohua, HUANG Xinjie

Abstract: Most of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Hou Han Shu* in the Song Dynasty have clear records and well-documented provenance, but there are many details of the Futang editio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at have not yet been clarified. The name of "Futang Jun Xiangben" derives from Ding Bing's discussion of the *Han Shu* edition in his *Collection of Rare Books*, while the Futang version of *Hou Han Shu* lacks records. According to the collation and analysis,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Southern Song Futang edition of *Hou Han Shu* should be the No.0088 cop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dition of *Zhonghua Zaizao Shanben*,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local cooperation between Fujian and Zhejiang, and the publication time should be from the end of Shaoxing to the Yuan Dynasty. Some of the *Hou Han Shu* editions of the Futang edition are known as the Futang Junxiang edition, and some are known as the Fuqing County Xueben. The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 in name is that the Futang edition has begun to be supplemented in the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ile the two editions of the board and layout, text content, engraving, collection origin, ink nails and supplementary edition leaves are differ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distinguish the two subsystems of Futang Jun Xiangben and Fuqing County edition.